

胡适研究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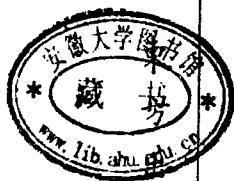
安徽大学
胡适研究中心编

东方出版社

胡适研究

第一辑

主编 沈寂
副主编 汤奇学 马勇



版
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版式设计:赵迎珂

装帧设计:王师韵

责任校对:高丽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研究 第一辑/沈寂主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5

ISBN 7-5060-0687-1

I. 胡…

II. 沈…

III. 胡适-学术思想-思想评论-文集

IV. B26-53

胡 适 研 究

第一辑

HUSHI YANJIU

沈 寂 主 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875

字数:310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 7-5060-0687-1/B·79 定价:21.40元

编 者 的 话

胡适认为人物“传记是历史的来源”，“中国的正史，可以说大部分是集合传记而成”。对“关系一国生命”，或“造福一方，而影响全国”的关键人物的研究，则可为社会取法，也可为后人借鉴。胡适在我国近代史上也算得上是这样的人物。

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打破了东方帝国一统天下的格局，为适应世界潮流，有识之士倡导开放改革。本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是我国继物质层面、政治体制革新之后的一次深入文化层面的革新运动。它给人们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以全新的观念。我国的现代化，从其根本意义上说，是由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它巩固了洋务运动起步的生产方式，总结补充了戊戌变法以来，包括立宪、革命等对政治体制的革新成就。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之一，提倡“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即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他对个人主义伦理的现代化，固有文化的充分世界化，以及政治的民主化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革新的意见与主张，堪称一家之言。50年代，在政治大批判中，胡适的上述主张与意见，曾受到“左”倾思想的统整。70年代末拨乱反正，又恢复了学术界的繁荣局面。今天，我们于本世纪末回顾世纪初或前半个世纪的历史轨迹，重新检验胡适当初提出的各种主张与意见，仅仅就这一方面，亦足以清楚展示出时代步伐的

正、偏与直、曲，是十分有意义的。

胡适当年提倡研究的问题，是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胡适当年所输入的学理，在当时来说也并非高深的或超时代的新论，而是讲究实效，以满足当时社会所需。今天有些问题已经解决，有些学理和方法也已不再适合时宜。但也有些问题却是解而未决，或根本没有解决；有些学理和方法，至今仍未失时效。唯他所企待的“再造文明”，亦即中国的文艺复兴，显然没有实现，或被根本否定了。这些却仍是值得接续探讨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今天正在迈大步，除需要参照横向的现成经验，也需要纵向的历史借鉴，以期迈出的步伐更壮健，更深入。这本《胡适研究》集刊，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应运诞生的。我们的宗旨与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溢美、不隐恶，贯彻“双百”方针，提倡“五四”以来各家争鸣的好传统。为学术界同仁提供胡适研究的一个园地。竭尽绵薄，愿与大家共同努力。热切希望得到学术界的支持。

《胡适研究》编委会

1995年6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论丛	(1)
胡适与中国哲学史	王 茂(3)
胡适对儒家精神的阐释	马 勇(26)
胡适与皖学	施忠连 红丽(41)
胡适对戴震哲学和治学方法评论	
——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专题之一	杜蒸民(57)
胡适早期禅史研究方法论刍议	潘桂明(72)
拒绝超验领域:胡适与宗教	王中江(94)
胡适文化观研究	陈子伶(113)
胡适社会历史观述评	王成儒(135)
胡适与教育救国论	吴二持(148)
胡适与“整理国故”	李妙根(168)
胡适的妇女观	房列曙(175)
理智思考抗日问题	沈 寂(194)
论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汤奇学(212)
胡适与孙楷第的学术情谊	李维龙(228)
胡适与陶行知	黄艾仁(245)

胡适的影子与和声

——从《古史辨·自序》看顾颉刚 沈卫威(262)

严复与胡适对“主义”与“问题”的思考 萧功秦(277)

关于胡适对清廷问题和善后会议的态度问题的

评议 胡 明(296)

“胡适研究”所涉及的学术课题

——试为“胡适学”初拟内容框架 朱文华(309)

胡著汉译 (343)

儒教在汉代被确立为国教考 胡适(韩荣芳译 陆发春校)(345)

中国历史上妇女的地位 胡适(韩荣芳译 陆发春校)(365)

中国正当十字路口

——新与旧的冲突 胡适(陆发春译 胡晓校)(377)

附录 (381)

胡适研究论著目录(1990—1993) 薛贞芳(383)

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章程 (402)

《胡适研究》集刊计划书 (405)

论 丛

胡适与中国哲学史

王 茂

—

杜威实验主义对哲学史的意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把欧洲近世哲学从休谟和康德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一齐认为没有讨论的价值。一切理性派与经验派的争论，一切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争论，一切从康德以来的知识论，在杜威的眼里，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不了了之。”^①这是胡适对杜威哲学史观的介绍。胡适是皈依杜威的实验主义者的，但他对中国哲学遗产的态度，却不是“不了了之”，而是情有独钟，毕生以之。似乎有违师教。其实，他最早的学术专著，1915—1917 在杜威门下做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就是一部纯然的哲学史讨论。他晚年回忆说：他“四十年成熟的生命里”，“主要兴趣之所在”，“至少有两大目标，一个便是中国文学史，另一个便是中国哲学史。”^②他一生的中国哲学史论著，近两百万字。著名的如《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

① 《实验主义》五，《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7 页。以下简称《资料选》。

② 《胡适口述自传》，十二，唐德刚整理译注。《资料选》下，第 262 页。

(1958年台北版,改名《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说儒》、《淮南王书》、《戴东原的哲学》等。胡适之学广博,涉及政论、文学、语言、历史、教育等多种学科,而卓然成书,卷帙浩繁的,当属中国哲学史一门。而其意义尚不在数量,主要的还在它的创新性。因为胡适是用现代的(虽然是西方的)观点、方法及形式整理、评价、分析中国哲学遗产的第一人。开凿浑沌,五丁辟道,为中国哲学史走上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原始模式。他的工作不是完美无缺的,也未能完成一部通贯古今的中国哲学通史,但是,他开了风气,发凡起例,从组织材料、安排篇章结构、语体、理论语言的运用等等方面,为后来继起者作了最初的示范。其开创之功,是不可没的。他的学术观点的是非得失,是可以商量的,他促使这个古老学科走上现代化,其贡献是应该肯定的。

胡适为什么以毕生大量精力投入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且从一开始(博士论文)就选择了这个方向呢?这是因为整理中国哲学遗产对他说来有着超越学科自身价值的更高的意义。他有自己的中国文化建设的纲领,这就是“五四”时期为北大学生刊物《新潮》(英译名意为“文艺复兴”)的题词:“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①“五四”前后,西方各种思想都输入到了中国。“输入学理”只不过说明胡适要输入的不是欧洲的洛克或康德,而是最时髦的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实用主义、实证主义),不过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重要的是“输入学理”何以又要“整理国故”,以及二者的关系。胡适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自己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它如何在一个大不相同的“新世界”、“新文化”中生存和发展?他认为:“如果那新文化被看做是从外国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强加于它的”,那么,这个古老的

^① 《新思潮的意义》,《资料选》上,第125页。

具有悠久而光荣的文化传统的民族,会感到“不自在”;同时,“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由于这些缘故,他提出:“在哪里能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① 这个基础在哪里?

“新中国(引者按:指辛亥革命后的民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按:指墨子、老子等先秦学说)。如果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②

这里说的“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自然指的是他从美国学来的实证、实用、实验的方法与工具。他说:“这些就是我写中国先秦名学史的理由。”^③可以说,这也是胡适四十多年孜孜不倦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的“理由”。

因此,就中国哲学史这个领域说,胡适要输入的主要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胡适所谓的“方法”。他说:“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④ 他举出欧洲近代科学是在培根《新工具》、笛卡尔《方法论》影响下发展起来作例证。据此,他认为:“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足以说明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但可以毫不夸

① 《先秦名学史·导论》,《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72页。以下简称《文集·中国哲学史》。

②③ 《文集·中国哲学史》,第774、775页。

④ 同上书,第768页。

张地说,哲学方法的性质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①这就是说,用何种思维方式去建构一个哲学体系,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因此,他明确表示:“我治中国思想与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着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得益于杜威的影响。”^②

胡适的“方法”,含意相当泛化,需要一些解释。此语有时也称“逻辑方法”、“名学方法”、“哲学方法”,指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一种思维方式;信仰主义、教条主义、主观武断也是思维方式。有时,他把一种哲学称为“应付困难问题的方法”,与“方案”、“途径”的意思差不多。有时,如时势决定哲学(属于哲学观、观点),哲学的价值由社会效果而定(与前项类似),研究哲学史必先明训诂(属于研究法、治学方法)等等,也称为“方法”。要之,他的“方法”主要指思维方式,正如杜威的代表性著作题名《思维术》。

“整理国故”是“输入学理”的桥梁。但是,胡适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濡染甚深,他不能割弃传统的文化。

胡适是清末民初最早的赴美留学生,在美国受了7年系统的大学教育,接受了西方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观念和欧美近代以来的学术成果。以此反观中国刚刚从封建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中摆脱出来的混沌状态,不能不感到中国的传统学问实有整理的必要。更重要的是,胡适自幼受儒家教育,宗主孔孟,诵法程朱,长期濡染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他是作为一位年轻的儒者去接受西方教育的,即使大量吸收了西方的精神营养,他仍是一位西式的中国士大夫。他不可能割断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联系。在这一背景

① 《文集·中国哲学史》,第771页。

② 《口述自传》五,《资料选》下,第106页。

下,他提出通过“整理国故”去“再造文明”,就是很自然的了。对国故的整理,实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指导方面建立新的观点和价值标准;一是从材料方面使之系统化、条理化,组成一部可读可信的专史。胡适指出:在中国传统哲学遗产这个领域,“它没有头绪,没有条理,没有系统,很少历史的眼光,不讲求学术渊源,而且大部分以讹传讹(如太极图、爻辰、先天、卦气等),武断成见(如骂杨朱、墨翟为禽兽,尊孔丘为德配天地等等)”。因此,有必要“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① 这里对旧学术的贬斥容有过当(如宋明已逐渐有了学派的学说史著作,如《伊洛渊源录》、《道南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即使对杨朱墨翟的评价,明清人已萌生了新看法,等)但总的说来,胡适的批评是有根据的。实际上,需要作系统整理的思想文化遗产,绝不止哲学史一项。辛亥革命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几乎所有遗产都面临一个整理研究的课题,而二三十年代此类专门史大量出现,实为时势的需要。

胡适对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总概念,表现在他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上。他划中国哲学史为三期:古代(或上古,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初);中古(公元初至10世纪左右,大体为秦至北宋初);近代(或近世、现代,公元11世纪迄胡适当世)。他提示说:古代是中国的“古典时代”,“这是个有创造性的时代,一个有原始性的固有思想时代。”中古,是“一个合久必分的局面”,“有一种‘变于夷者也’的趋势”,这是一个“宗教时代”。近代,他认为“从广泛的历史意义来说,我叫这个现代阶段为‘中国文艺复兴阶段’。”^② 这一分期

① 《新思潮的意义》三,《资料选》上,第131—132页。

② 《口述自传》十二,《资料选》下,第274、278页。

法,先借用一位研究胡适的专家的评论,他认为:“胡氏把一部中国史按西方学术界的传统办法,分为古代、中古和现代,这种分期法有好多人不赞成,……认为中国史不应按西方标准来分期,因为史有中西之别。”^①这个问题当然需要讨论,但因涉及学科的整体,必须另具专文。但有一点则是清楚的,把北宋程朱理学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把此后一千年订为“近代”(或“现代”),显然没有多少根据。而三期的上下限都很模糊。如中古宗教时期始于汉末,却又把西汉董仲舒的“儒教”也列入中古。又如近代上限在北宋真宗的崇信道教,但后来的徽宗不也是“道君皇帝”吗?至于元、清两代也存“变于夷”的宗教气氛,又岂能列于“近代”?等等。这些暂不讨论。本文为不打乱胡适的论述结构,仍按他的分期,分数节评介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二

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源头,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为辉煌的部分,而胡适所特别着意的“方法”问题、逻辑问题,也只在先秦哲学中有丰富的蕴藏。他的早期著作《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说儒》等名著,都以先秦哲学为对象。

胡适经常说到一句名言“重新估量一切的价值”(尼采)。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他实践了这句话。胡适晚年回忆说:“那《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册,当时却是一本开风气的作品。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项新特征,那便是我〔不分‘经学’、‘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

^①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十二,注四。

孔子同列。这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①他甚至自负地把这场“革命”比喻为哥白尼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②把儒与非儒一视同仁，平等看待，对二千年来奉儒学为正宗，视他家为异端的传统偏见，确是一个大突破。他从三方面展开相关的论说。即“诸子不出于王官”、“老先孔后”、“扬墨黜儒”。

（一）1917年，胡适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这是章炳麟（太炎）《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反命题。章据东汉刘歆《七略》，说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墨家出“清庙之守”等，论证“非仕无学，非学无仕”。这个观点相当保守。

胡适引《淮南子要略》，认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官无涉”。实际是说诸子（包括儒家）出于民间私学。这当然更适于说明春秋末战国初的情势。这个诸子不出于王官而出于私学的观点，前此是无人道及的。

（二）胡适提出：作为理论体系的哲学，首创于老子，而不是孔子，更不是伏羲画卦（与胡同时而稍前有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即持哲学始于伏羲画卦。谢著观点陈旧，体例芜杂，不足以代表新哲学史，故其影响甚微，不久即为人遗忘）。胡适回忆说：“在民国六年我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哲学史之前，中国哲学要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讲起的。……我第一天讲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几乎引起了班上学生的抗议风潮。”^③如果老子的年代大致与孔子同时，就二者哲学理论的系统性和成熟性而言，《老子》当然超越《论语》。《论语》的哲学意味是很淡的。胡适以老子为中国哲学开山，自有道理。当时持异议者主要提出老孔生卒年代先后问题，胡

① 《口述自传》十，《资料选》下，第222页。

② 同上书，第262页。

③ 《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文集·中国哲学史》，第6页。

适的《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就是参加这场争论的著名文章。

最初，胡适介绍孔子哲学，并不是以《论语》，而是以《易经》为据（见《名学史》、《大纲》）。其实，八卦图象，其源甚古，与孔无关；所谓《十翼》出于孔子，亦无确证。这表明早期胡适专心老、墨，涉儒不深，尚未摆脱传统成说。

（三）胡适倾心墨学。他评定墨学的实质是“应用主义”、“实利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墨家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又有许多共同之处”。^①因此，“墨翟也许是在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②关于孔子与墨子的比较，他认为：墨学有方法论，而孔子则没有。孔子所重在“理想的目的”；墨子所重在“进行的方法”，孔子要问的是“什么”，墨子问的是“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③在我们看来，二家体系不同，但各有其目的与方法。儒家的“学”、“礼”就是方法；墨家的“兼爱”、“天志”也是目的。儒侧重义，墨强调利，两家的大区别在于社会价值观，而不能说是“方法”。

胡适研究墨子，最大成就在《墨经》的逻辑学与自然科学方面。其《〈墨子·小取篇〉新诂》尤为名篇。这方面的工作，不自胡适始。自墨子被孟子斥为“无父无君”的“禽兽”，沉埋二千多年。清代中叶，在理性和批判的思潮中，汪中、孙星衍等已试图重新估定墨子。继之，王念孙父子、俞樾、孙诒让为之定训诂音读；清末时务派邹伯奇、薛福成稍通西书，已发现《墨经》的科学价值。胡适承前人成果，以自己的西学知识为工具，对《墨经》作了较系统精密的研究。当时墨学专家章行严、梁启超推许胡为此学“祭酒”，“深造盖迈先辈”。实验主义对形式逻辑是评价甚低的。但胡适研究墨子的主要成就，正在对其形式逻辑内容的解释与分析。这也是胡适对实验主义的

①②③ 《文集·中国哲学史》，第107、815、107页。